

贵州遵义——伟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新华社记者 黎云 孙鲁明



这是遵义会议会址外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宋开君摄)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一份解放军档案馆里的历史档案记录:“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恢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已经从近期的作战思路变化中发现了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老红军方强生前回忆:“我偷偷问了营长,突然改变计

划,是谁的主意?营长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说:“毛泽东……”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瓷蓝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被抽调出来担任南门警卫任务的红



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2016年6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一个大火盆烧起了炭火,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陆续赶来。杨世林担任警卫的南门是进入会场的主要通道,他生前回忆:“毛主席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

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参会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刚好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就让他躺着开会。杨世林还记得李德来得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脸红。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焜,从门窗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军官兵则并不知情。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允许脱衣服,枪挟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袁焜生前回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绕到北门看望警卫战士,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袁焜所在的红37团官兵列队回答:“不辛苦!”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在机要科听到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

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生前回忆:“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诗。”事实确实如此——红军四渡赤水之后,终于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这是1月26日拍摄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全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这座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的诞生。”83岁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田兴咏说。

“这棵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唯一一个‘活着的文物’了。”67岁的“树医生”张本光说。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东侧一棵高10余米的大槐树,几乎在所有有关会址的图片、镜头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相依相伴的身影。

一座楼,一棵树,风雨同舟80多载,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它们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初强渡乌江后,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红军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即后来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

“柏辉章是国民党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建造的柏公馆,用料很讲究,比如花窗、彩色玻璃等,在当地很罕见,据说很多都是从上海专门运到遵义的。”田兴咏说,“柏公馆建了大概一年多,成为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房子旁边种了棵小槐树。”

柏辉章公馆当时在遵义城内无人不晓,红军到达遵义城之后,柏辉章家人吓得逃跑了,红军

总司令部驻扎了进来。

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椅子围成一圈。

当年,20名参加者,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

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他的欢欣鼓舞。

遵义会议在每一位经历者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多少年后,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清楚记得的,还有会址外的那棵小槐树。

20世纪70年代,田兴咏为了收集长征资料,

一座楼·一棵树·一个光辉时刻

——遵义会议会址的红色故事

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李惊亚 刘智强

来到北京采访康克清。

“康大姐说,召开遵义会议时,她居住在二楼一个房间里,打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田兴咏说。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生机。

记者登上遵义会议会址主楼二楼,站在位于东侧的“朱德、康克清住室”走廊上,可以看到,走廊护栏与大槐树树干距离很近,散发的大槐树的枝条,来客甚至伸手便可够到。

据统计,1970年以来,遵义会议会址接待中外游客近9000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聆听红军生死转折的故事,了解到这座小楼非凡的意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棵大槐树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这棵槐树就是一棵有生命的文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转折的见证者。当人们看到这棵树,就会想起那份记忆,深受感动。所以我对它情有独钟,很珍惜它。”和古树名木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本光说。

2003年,大槐树树干上因细菌引发了一颗直径45厘米的“恶性肿瘤”,张本光果断决定用斧头切除,共修补了7处地方。切除“肿瘤”后的大槐树,生长得更加枝繁叶茂了。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病虫害它都遇到过。”张本光说,“就像一个政党,发展道路上也会碰到各种问题,关键是要向恶疾亮剑,对病灶开刀。”他拿着枝剪、铲子等工具,一面为大槐树清理青苔、修剪枝条,一面对记者说。他会定期来会址,义务为大槐树做“体检”,以防病虫害。

岁月如梭,80余载时光,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哪怕风高浪急,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如磐石,信念的力量驱动着他们乘风破浪。

“要让‘干人’(穷人)过上好日子!”在遵义农村的一些老建筑上,这样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也有这样的类似标语。在那些战争岁月里,每到一地,红军都要打开地主、富户的粮仓,把粮食分给那些被反动派榨干了的穷苦百姓。

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不移的崇高理想,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代代共产党人,将信仰的旗帜高高举过头

顶,将必胜的信念牢牢埋在心底。

英雄的精神在红色土地上绵延,在新的战场上传承,书写着穿越时空的信仰答卷。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100公里的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共产党员黄大发自20世纪60年代起,带领200多名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被称为“大山里的愚公”。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今的共产党人同样斗志昂扬。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市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51.38万人,先后实现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871个贫困村出列,撕掉了千百年来贫困标签,书写了新的转折。

“遵义人民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在这片土

地上的英灵。”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说,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始终是遵义人民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

如今,游客来到会址参观会发现,小楼旁的大槐树不止一棵,而是两棵了。20世纪80年代,大槐树的一颗种子落到树下泥土中,慢慢生根发芽,如今也有10米高了。两棵槐树生长方向正好相反,慢慢地,竟然形成一个“V”字形。

“‘V’象征着中国革命必胜,中国新的百年必胜。”张本光说。

如今,站在大槐树下,用手指比一个“V”字,与会址合影留念,已成了不少年轻游客“打卡”会址的流行拍照姿势。

胜利在来时,胜利在当下,胜利在前方,似乎已成为属于这座楼与这棵树的特殊符号和专属意义。



1月27日,67岁的“树医生”张本光在养护遵义会议会址前的槐树。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